

林慶彰 主編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

花木蘭
文化出版社
出版

中國學術思想

研究輯刊

三 編

林 慶 彰 主編

第 26 冊

梁啓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

王 心 美 著

熊十力《新唯識論》研究

——以《新唯識論》所引發儒佛之爭爲進路的探討

林 世 榮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梁啟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 王心美 著／熊十力《新唯識論》研究——以《新唯識論》所引發儒佛之爭為進路的探討 林世榮 著——初版——台北縣永和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9（民98）

序 2+ 目 2+126 面／目 2+122 面：19×26 公分
（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；第 26 冊）

ISBN：978-986-6528-96-5（精裝）

1. 梁啟超 2. 熊十力 3. 學術思想 4. 現代哲學 5. 唯識
128.2 98001814

ISBN - 978-986-6528-96-5



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

三 編 第二六冊

ISBN：978-986-6528-96-5

梁啟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

熊十力《新唯識論》研究

——以《新唯識論》所引發儒佛之爭為進路的探討

作 者 王心美／林世榮

主 編 林慶彰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

初 版 2009 年 3 月

定 價 三編 28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46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梁啓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

王心美 著

作者簡介

王心美，生於台灣嘉義，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。現任職新竹縣大華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，講授中國近代史、台灣史，著有《梁啟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》。

提 要

梁啟超生歷清朝末年過渡到民國初年的求變轉型時代。其思想上的屢變屢遷，與清末民初時局的雲變波折互為相應；而其前瞻先驗，透過他聲情激越的文字，導向了新中國加快形塑與發展。是故，梁氏個人思想上的演進轉變實為中國近代歷史轉化過程的投射縮影。基於此一旨趣，本文乃探討梁氏思想上屢變屢遷的契機造因與畢生憂念之所在，意欲透過對梁氏個人思想轉折的了解，順勢將中國近代的變遷具體而微的呈現出來。全文凡分六章，其要點如后：

第一章，緒論。旨在分析梁氏身處的時代背景，明其環境之特質與殊異，並說明前人研究的方向與成果，以及筆者所著重的方向，以導入本文主題。

第二章，傳統中尋求變革理念（1890～1898）。闡明梁氏早期主要在其師康有為「三世之義」的啟示影響下，衍化出求變革、興民權的理念。第一節，言梁氏早年學知目標，與傳統士子並無二致。第二節，說明梁氏入學康門，思想重新大為開啟，獲得「三世之義」為求變的基礎理論。第三節，申述梁氏主持時務學堂時期，仍在其師思想籠罩下，倡興民權與種族革命。

第三章，西方思想的涵泳與影響（1899～1917）。梁氏流亡日本後，廣泛的接受西方思想，西哲的思想學說變成他言論上新的依據，西方富強的極則：民權、自由、進化觀念成為其絕對的信仰。本章旨在探討梁氏思想上的變化，並究明其內在底蘊。第一節，研究梁氏言論轉變的由來。第二節，分析梁氏流亡日本前期盛倡的激進革命的政治主張。第三節，先探究梁氏流亡日本後期言論轉趨保守的原因，再述及此時期其緩進改良的政治主張。

第四章，歐遊後的思想轉折（1918～1929）。闡述梁氏歐遊後思想上的轉變與新論。第一節，申述梁氏民國政治作為的失意，導致了歐遊之行。第二節，闡明梁氏反對歐洲過度發展物質文明與信賴科學萬能的辯解。第三節，探討梁氏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與駁斥馬克斯主義的理由、論證。

第五章，傳統文化的重新體認。旨在闡明梁氏的儒家唯心意識，至「五四」時期，在全面反傳統運動中，強化轉為護衛傳統文化的過程。第一節，先由反孔疑古與再創世界新文明說起，以引入本章。第二節，闡述梁氏整理國故的成果。第三節，說明梁氏對於儒家倫理文化的重新肯定與推引。

第六章，結論。綜合前述各章論點，並將筆者之觀點予以申論，以結本文。

自序

本書探討梁啟超一生思想屢變屢遷的契機造因。清末民初的形變轉型時代，有志知識份子莫不懷抱「破與立」的想望，一方面急欲速崩裂解晚清體制，一方面熱切追模想像新中國的產生。其間，梁啟超是最亮眼引人的一位。民國前，他以飽含情感之筆，幻化魔力文字，時刻傳輸憾人魂靈的改革思想，甚且一度激進的昌言革命；民國後，他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價值，在反孔疑古的思潮中，攘臂護衛以孔、孟為主導的儒家倫理思想。其思想幾番變易轉折，時而激進，時而保守。其依違衷棄之理為何？是個性流質使然？是傳統理念、西方思想的影響？抑或因應時局變化的轉圜取決？這些疑問都是我在本書中要分析探討的，並進一步歸結梁氏畢生憂念與終極關懷之所在。

本書的分期斷限及多項論據上的依持，蒙受張朋園老師《梁啟超與清季革命》、《梁啟超與民國政治》二書影響與啓示甚多。復承張老師在觀念上多方開導與指引，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。此外，堪為言述的是：於我人生歲月，自彼時寫作論文之日起，直到如今，張老師如父執師友，時為督責鼓勵，這份可貴的情誼與難得的福氣，實緣於研究梁啟超而識得，謹記之。本書完成，距今久遠，筆法識見難免簡陋；復因倉促成篇，舛錯繆誤頗多，尚祈學界先進不吝賜正。

附錄的兩篇論文〈試論班昭《女誡》的女性倫理觀〉與〈《大同書》中的性別烏托邦〉，曾先後發表於《大華學報》（1997，2000），與本書研究主題並無關聯。彙集合併刊行，一方面在使這本小書豐厚些；一方面，以資記錄近年來我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進修時對婦女／性別史的研究思考。〈試論班昭《女誡》的女性倫理觀〉一文，探究班昭《女誡》的女性倫理觀及其一生行

止的內在意義。〈《大同書》中的性別烏托邦〉，辨析康有為在《大同書》中所建構的性別烏托邦的意涵，並界定《大同書》中的女權思想在近代婦女解放運動中的歷史位置。

本書倉促完稿於一九八二年的夏天，是我在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學習成果。多年舊作，不意今日竟有面世的機會，感謝花木蘭文化出版社的襄助促成。

王心美 二〇〇八年七月於新竹



目次

自序	
第一章 緒論	1
第二章 傳統中尋求變革理念（1890～1898）	5
第一節 早年私塾教育——帖括訓詁詞章	5
第二節 萬木草堂時代——三世之義的啓示	6
第三節 時務時代——「醉心民權」「種族革命」	11
第三章 西方思想的涵泳與影響（1899～1917）	19
第一節 言論轉變的由來	19
第二節 流亡日本前期——盛倡革命破壞	22
一、民權自由	22
二、破壞主義	26
三、新民學說	28
第三節 流亡日本後期——禮贊緩進改良	32
一、國權思想	38
二、君主立憲	41
三、開明專制	42
第四章 歐遊後的思想轉折（1918～1929）	45
第一節 民國政治生涯的失意	45
一、由虛君共和到民主共和	45
二、組織政黨	48
三、兩度從政——聯袁携段的失敗	50
第二節 歐洲物質文明破產與科學非萬能說—— 揭開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序幕	55
第三節 從反對馬克斯主義到發展中國實業	60
第五章 傳統文化的重新體認	71
第一節 引論——由反孔疑古與再創世界新文明 說起	71
第二節 國故的整理	78
第三節 儒家倫理文化的再肯定	81
第六章 結 論	85
徵引及參考書目	89
附 錄	95
附錄一：試論班昭《女誡》的女性倫理觀	95
附錄二：《大同書》中的性別烏托邦	107

第一章 緒 論

近代中國自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由鴉片戰爭揭開序幕後，中國在各方面均面臨「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」，進入一個迅速變遷的時代。從器物模仿的自強運動到制度層次的維新變法，再到全面反傳統的「五四」時期，中國由「近代」過渡到「現代」，經歷了一段漫長而痛苦的形變過程。

從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，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，至甲午戰爭，三十餘年間，在清政府中有識的皇族大臣及知識份子，如奕訢、文祥、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張之洞等人的領導下，展開了同光年間的洋務運動。其基本精神在於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和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。所見者，惟西洋之船堅礮利、器物精絕而已。對於政治、教育及制度上的根本改進，則始終未曾言及。

甲午之役起，滿清政府不堪一擊，列強乘機漁利中國，知識份子已意識到非變不足以救亡，感悟昔日「體用」之說非，西方可學習的不止技器，更在政教。在優異份子（elite）康有爲、梁啓超的領導下，戊戌變法運動於焉展開，由「器物模仿層次」轉進到「制度變革層次」。

至於民國以後的「五四」運動，本質上是秉持「外抗強權、內除國賊」的愛國意識，以學術爲首，同時從事政治與社會全面的改革，而其成效則在於意識型態的改變。其進取、前瞻的精神，絕非中體西用的自強運動與託古改制的戊戌變法所可企及。但是在全面反傳統與「全盤西化」的倡議中，以新思想代替舊思想與舊傳統，成爲「五四」時期的主導觀念，傳統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，加上各種主義的紛至沓來，在新、舊思想的吸收與排斥作用中，引起了混淆與迷亂的現象。

具體而言，近代中國的產生始於中西文化的衝突與對壘。在紛乘繁複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中，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，身處此激變的時代，面對舊體制、文化雙向崩潰的困境，如何調整其傳統角色與行為模式，引進西方思想學說促使中國的富強與維護傳統文化的價值，成為最迫切的關懷與積極尋求的目標。梁啟超（1873～1929）即是生長在此一時代，由傳統士人角色出發，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的典型代表人物。

梁啟超生當一個求變的時代，面對國事杌隉、復因熱情敏銳的心靈和流質易變的性格，在時代的衝擊下，自然能夠突破自我與時代的限制，成為一個求變的人物。綜其一生，莫不以現存的政治實體為銜繫思想言論的中心，發之為文，必至造成風靡而不可收拾。究其原因，為其應合了時代求變的需要，自然成為風潮中心。

就梁氏的思想而言，因為他深於舊學傳統，容或隱含保守成份，但是却有相當自由和進取的趨向。以當時而言，確為時代的新銳思想者。在創開風氣之先方面，他也和大多數生在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一樣，內在的反省在求富強，外在的行動則要追摹西方列強。本此尋求國家富強的意願，他所引介給中國的西方觀念乃或在自身國度裏所衍生的思想，難免流於廣泛與偏執、甚至是淺陋、摹擬的，但却對當時的中國產生相當強度的影響。

近世研究梁啟超的學者甚眾，筆者在此作一簡明引介：

Levenson, Joseph R. *Liang Ch'i-ch'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3.

張朋園，《梁啟超與清季革命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53年。

Chang, Hao. *Liang Ch'i-ch'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, 1890-1907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.

Huang, Philip C. *Liang Ch'i-ch'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*. 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72.

張朋園，《梁啟超與民國政治》，臺北：食貨出版社，民國67年。這四位學者研究的方向，或專注於梁氏與中國政治演進的關係，或偏重於梁氏思想轉折的探討，或著意於梁氏與中國思想的過渡與演變。

而筆者著重的方向，乃試以「梁啟超思想之演進與轉變」為題，首先探究梁氏生當激變時代，他如何調整其行為模式與重新界定其「自我」的角色？

其次，試圖對梁氏思想上的屢變屢遷找出其契機造因與內在底蘊，並藉此對近代中國社會與思想的變遷，作一番具體而微的觀照與了解。

第二章 傳統中尋求變革理念（1890～1898）

第一節 早年私塾教育——帖括訓詁詞章

梁啓超，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又號飲冰室主人，廣東新會人，同治十二年正月廿六日（1873）生於廣東新會縣能子鄉茶坑村。其先世「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，明末由南雄徙新會，定居焉，數百年棲於山谷，族之伯叔兄弟，且耕且讀，不問世事，如桃源中人」，〔註1〕至其祖父維清先生始「肆志於學」，〔註2〕致力於科舉仕途，「爲郡生員，例選廣文不就」，〔註3〕其父寶瑛先生亦由此途奮進，「少亦治舉子業，連不得志於有司，遂謝去，教授于鄉」。〔註4〕梁氏即出身於此藉科舉爲進陞途徑，達到「學而優則仕」的目的，躋身於官紳之列的傳統耕讀之家。

清室歷經康、雍、乾三朝承平後，至乾隆中葉後，政風日頹，吏治中衰，末葉時，民變即屢見不鮮。至嘉慶朝，內亂陸續引發，白蓮教亂、海寇蔡牽之亂、回部張格爾亂事等相繼而起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鴉片戰爭的爆發實開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，門戶自此打破，內在體制的衰弱疲敝阻扼不了西方勢力的節節相逼，內憂外患接踵而至。梁氏出生之年，正值鴉片戰爭後的三十三年，英法聯軍之役後的第十五年，洪楊之役後的第十年。處此劇變

〔註1〕 梁啓超，〈三十自述〉，《飲冰室文集》（以下簡稱《文集》）11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49年，頁15。

〔註2〕 梁啓超，〈哀啓〉，《盾鼻集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50年，頁127。

〔註3〕 同註1。

〔註4〕 梁啓超，〈哀啓〉，《盾鼻集》，頁127。

壓迫的時代中，朝野莫不慷慨激昂、圖變覺醒。而受傳統教育的士紳大夫，在此思想變遷之際，其傳統社會角色與行為模式亦面臨重新調度與取向的情境。梁啟超即在此時代背景的衝擊下逐漸成長、變化其思想理念。

早年，梁啟超和其他士子一樣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私塾式的教育。從四歲起，就開始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，「夜則就王父榻，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，而尤喜舉亡宋、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」。^{〔註5〕}六歲，就父讀，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。十歲，就童子試，十一歲，初見張文襄之《輶軒語》和《書目答問》，「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」。^{〔註6〕}十二歲，應試學院，考中秀才，補博士弟子員。在此後的兩三年裡，梁氏即在這條科舉老路上打轉：

日治帖括，雖不嫌之，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，更有所謂學也，輒埋首鑽研，頗頗喜詞章，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，嗜之過八股。家貧無書可讀，惟有《史記》一、《綱鑑易知錄》一，王父、父日以課之，故至今《史記》之文，能成誦八九。父執有愛其慧者，贈以《漢書》一，姚氏《古文辭類纂》一，則大喜，讀之卒業焉。^{〔註7〕}

光緒十一年（1885），梁氏十三歲，是年始治段、王訓詁之學。十五歲，正式進入了廣州府的學海堂讀書。學海堂是前任兩廣總督阮元設立的，其目的則在於讓廣東士子有接觸訓詁詞章的機會。梁氏同時亦為菊坡精舍、粵秀書院、粵華書院的院外生，這些廣州府的最高學府，講究的亦為考據、詞章、訓詁之學。梁氏在極富漢學精神的教導方式下，遂跳出了帖括之學的禁錮與窒礙，至是乃決舍帖括而從事於訓詁詞章的研究，「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」。^{〔註8〕}

從帖括之學到訓詁詞章的訓練，梁啟超所接受的只是一般傳統的教育方式，乃士子進階之因緣工具，但是由經、史、子、集的熟習到辯偽、考證的訓練，為他日後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基礎。

第二節 萬木草堂時代——三世之義的啓示

清學自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、乾隆的考據之學到道咸以來的今文經

〔註5〕 〈三十自述〉，《文集》11，頁15～16。

〔註6〕 〈變法通議——論幼學〉，《文集》1，頁55。

〔註7〕 〈三十自述〉，《文集》11，頁16。

〔註8〕 同前註。

學，凡有三變。儒學發展至明末時，「尊德性」與「道問學」兩派爭執不下，其義理的是非自必取決於經典；而滿清入主中原、河山易主，社會動蕩、殘破，學者士大夫引爲己責，力矯明學末流空虛，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，爲學質諸先覺、考諸古訓，於是以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船山、朱舜水爲主的經世致用之學應時而起。經康、雍、乾整治局勢後，天下日趨安寧，在清廷屢興文字獄及「右文之主」的籠絡手段下，學術研究偏離政治而歸趨單純健實，衍成乾隆考據之學，代表人物爲惠棟、戴震，其治學方法在「實事求是」「無徵不信」，研究範圍，以經學爲中心，旁及小學、音韻、校勘……等。道咸以後，清學又面臨分裂，純學術的研究限制了思考、眼界，流於窒礙、專制；嘉道以還，積威日弛，復面臨外患壓境、西學之漸輸入，思自湔拔，於是對外求索日熾，對內厭惡之情日烈，常州學派應時而起，此派以莊存與、劉逢祿爲代表，宗今文春秋公羊之學，其要旨爲張三世、通三統、異內外，以新的眼光研究孔子的《春秋》，摒棄訓詁詞章的考據之學，講求思想的自由解放，後世學者更藉「微言大義」譏切時政、詆排專制。此學派經龔自珍、魏源的大力提倡後，再加上廖平、朱次琦的推波助瀾，一時今文經學蔚爲大觀，導向了康有爲成爲近代今文經學的歸趨大成者。〔註9〕

康有爲出身的家庭屬於傳統的官紳階層，在這個階層強固意識的要求下，亦必循科舉之途爲進陞的途徑。康氏在光緒二年（1876）十九歲以前從其祖父連州公就學於官舍，學習帖括考據之學，而於九江禮山草堂從學於朱次琦後，思想上發生極大的變化。〔註10〕其後退居西樵山兩年，「專爲深沈之思」、「窮爲天人之故」，欲自創一派，而歸於經世之用。〔註11〕光緒五年（1879），薄遊香港。八年應順天鄉試，道經上海，知西人治國有法度、治術，復大購西書以歸，閱《海國圖志》、《瀛環志略》等書，漸收西學微意，自是大講西學。〔註12〕康氏在環境的刺激與感念中，決心捨棄前學，藉今文公羊學爲引，以經營天下爲志，提出了維新變革的理想。

光緒十六年（1890），八月，梁啓超十八歲，因同學陳千秋的介紹初識康有爲，拜於康的門下。自此，康氏爲梁啓超開啓了一個新的天地：

〔註9〕參見梁啓超，〈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〉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59年，頁11～13。

〔註10〕參見康有爲，《康南海自訂年譜》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民國55年，頁7～11。

〔註11〕梁啓超，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臺北：中華書局，民國49年，頁132。

〔註12〕參見康有爲，《康南海自訂年譜》，頁7～12。

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。時余以少年科第，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，頗有所知，輒沾沾自喜。先生乃以大海潮音，作獅子吼，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，更端駁詰，悉舉而摧陷廓清之。自辰入見，及戌始退，冷水澆背，當頭一棒。一旦盡失故壘，惘惘然不知所從事。且驚且喜，且怨且艾，且疑且懼。與通甫聯床，竟夕不能寐。明日再謁，請為學方針，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。自是決然舍棄舊學，自退出學海堂，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。生平知有學，自茲始。〔註13〕

梁氏初入康門，接觸到的一切均是新鮮的。康氏的《長興學記》隱含的民權、平等之旨意即首先啟發了他，成為日後孜孜從事的準則。〔註14〕直到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，梁啟超在康有為的教導薰陶下，不僅捨棄了傳統的詞章訓詁之學，更獲得了思想上的啟發，其一生學問皆得力於此，奠定了日後賴以從事變革運動的基礎。

康有為之學術思想雖承常州學派而來，其改制之說却不同於劉逢祿、龔自珍輩。康氏所謂之改制，實含有政治革命，社會改造的意味，而以三世三統闡明改制進化之義：

……喜言「通三統」；「三統」者，謂夏、商、周三代不同，當隨時因革也；喜言「張三世」；「三世」者，謂據亂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，愈改而愈進也。〔註15〕

康氏更以三世之義解說〈禮運〉，謂「升平世」為小康之治，「太平世」為大同之治。〔註16〕然康氏却謂今乃亂世只能言小康不能強行大同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。而梁啟超聞得此義則大樂，銳意欲將之宣傳，以進於大同之世：

秦以前，據亂世也，孔教行於齊魯；秦以後迄今，昇平世也，孔教行於神州。自此以往，其將為太平世乎！〔註17〕

三世進化論非僅是康有為思想體系的脊樑，亦是梁啟超在萬木草堂的教育下所得到的最深啟發。直到三十歲止，梁啟超雖然接觸並提倡西學，但三世之義一直是支持他思想理論的重要依據，並從而演繹出他對於政治、經濟、教

〔註13〕 〈三十自述〉，《文集》11，頁16～17。

〔註14〕 〈變法通議〉，《文集》1，頁55。

〔註15〕 梁啟超，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頁130。

〔註16〕 同前註引書，頁132。

〔註17〕 〈新學偽經考序〉，《文集》2，頁62。

育等方面的主張和要求，〔註 18〕最重要的乃是此說形成了他早期民權說的有力論證：

治天下者有三世：一曰多君爲政之世，二曰一君爲政之世，三曰民爲政之世。多君世之別又有二：一曰酋長之世，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。一君世之別又有二：一曰君主之世，二曰君民共主之世。民政世之別亦有二：一曰總統之世，二曰無總統之世。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，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，民者太平世之政也。此三世六別者，與地球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關之理，未及其世，不能躐之，既及其世，不能闕之。〔註 19〕

又說：

春秋之言也有三世：曰據亂，曰升平，曰太平。啓超常謂據亂之世則多君爲政；昇平之世則一君爲政；太平之世則民爲政。凡世界必由據亂而昇平而太平，故其政也，必先多君而一君而無君。……惟政亦爾，既有民權以後，不應復有君權。……地球既入文明之運，則蒸蒸相通，不得不變，不特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，即各地土番野蠻亦當丕變，其不變者即漸滅以至於盡，此又不易之理也。〔註 20〕

又說：

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，其間必經一君之政，乃始克達。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，一君之運短；中國則多君之運短，一君之運長。至其自今以往，同歸民政。〔註 21〕

除此外，梁氏爲文時亦大量引申三世之義作爲論說的憑依，三世之義變成了他求變的基礎理論。據此，梁氏更進一步以天下爲己任，欲進小康於大同。而欲臻至太平之世，大同之治，必先增進國民之識力，轉變國民之思想，其途則在於發揚孔子的真教旨。他認爲孔子之教旨是進化、平等、兼善、強立、博包、重魂六大主義，賦含進步平等、開啓民智、自立自強、寬容犧牲的精神。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彰，乃在於傳授轉變之謬誤也。〔註 22〕

〔註 18〕參見張朋園，《梁啓超與清季革命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民國 58 年，頁 14。

〔註 19〕〈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〉，《文集》2，頁 6。

〔註 20〕〈與嚴幼陵先生書〉，《文集》1，頁 108～109。

〔註 21〕〈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〉，《文集》2，頁 60。

〔註 22〕〈論支那宗教改革〉，《文集》3，頁 55。